将相文武风流千古

——裴氏人物志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河东裴氏研究丛书之一

将相文武　风流千古

——裴氏人物志传

西　江　　编撰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相文武·风流千古：裴氏人物志传/西江编撰校注.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河东裴氏研究丛书）
ISBN 7-5004-2933-9

Ⅰ.将… Ⅱ.杨… Ⅲ.姓氏，裴-人物-列传-山西省 Ⅳ.K8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29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2.625	插　　页	4
字　　数	61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河东裴氏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柴泽民　姚奠中

主任委员　申维辰

副主任委员　申存良　薛俊华　谢洪涛　黄有泉
郭贵春

编　　委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水成　王慕工　孔富安　邓松录
申存良　卢　瑜　李书华　李　歆
李中元　刘毓庆　张明旺　张英俊
杨西江　孟　科　荆青莲　黄有泉
阎凤梧　逯哲锋　郭贵春　裴成发
裴一平　薛俊华　薛洪涛

执行主编　杨西江

代　序

在华夏文明摇篮古河东，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端的裴柏村，曾出过一个辉映中华几千年文明史的裴氏家族。裴氏这个三晋望族，上自周秦，下迄于今，绵延二千六百年，名人辈出，灿如繁星。尤其是自魏晋至隋唐的七个世纪里，更是代有才人，各领风骚。诸裴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均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裴氏一门历代曾担任过宰相的有六十人、中书侍郎十四人、尚书五十五人、侍郎四十四人、常侍十一人、御史十人、使二十五人、刺史二百一十一人、大将军五十九人、太守七十七人，封为皇后的三人、太子妃四人、王妃二人，做了驸马的二十一人，郡守以下不计其数。两千多年来，各种官员多达三千余人，可谓蔚为大观，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特现象。尽管裴氏一个帝王也不曾出过，也堪称“将相接武，公侯一门”了。难怪宋代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赞叹“宰相世系以裴为首，岂不盛哉!”1958 年，毛泽东在与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一次谈话中，对闻喜裴氏宰相之多、业绩之盛大加赞赏，胡耀邦也说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不研究“南林北裴”。此言既出，几近四十年，然而关于裴氏的研究仍未能很好展开。这篇序文的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推动学术界对裴氏现象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诸裴传略，并非全以闻喜为籍里，笔者却将之统统归属于河东裴氏，盖本于“天下无二裴”之说。此说何来？查《裴氏世谱》便可知晓。且看《裴氏世谱》列述的裴氏世系线索：有熊氏（黄帝）——昌意——颛顼……（苗裔）女修——皋陶——伯益（舜赐嬴姓）——大廉（鸟俗氏）……（四世孙）中衍……（四世孙）中谐——蜚廉——恶来（恶来革）——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蓋乡侯……（六世孙）陵（封解邑君，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将𦍒除邑从衣，以裴为氏）——鍼……（裔孙）盖——因——佑——抚恤……（六世孙）遵（自云中徙安邑）——？——？——岑、晔——羲、茂——潜、徽、辑、绾……（以下从略）

世系简表告诉我们，裴氏源出有熊氏，风姓，为黄帝后裔，到伯益时，由舜赐姓嬴，与秦同祖。传至犖乡侯六世孙陵，封为解邑君，才将𦍒去邑从衣，以裴为氏。裴，衣长貌。上古并无“裴”这一姓氏，裴氏始于周僖王（一作釐王，公元前681年—前677年在位）时代的裴陵，可见裴姓产生距今已有2680年的悠久历史了。我们研究裴氏，当以裴陵为始祖。再据当时庶人无氏，氏以别贵贱的礼制可知，裴氏当时已跻身贵族之列了。随着姓氏混一的潮流，裴由氏逐渐演变为姓。裴陵的十六世孙裴茂有四个儿子潜、徽、辑、绾。裴潜、裴绾世居闻喜裴柏，号为“中眷裴”，其后散居河东一带，至唐代已传至二十世，分为八裴十二族，至今已传到七十三代；裴辑移居幽燕，其裔号为“东眷裴”，至明代中期，已传三十六世；裴徽移居长安及西凉，其裔号为“西眷裴”，至北宋已传二十四世；裴茂的五世孙裴诜与兄长之子瑾自河西归居解县洗马川，其族号为“洗马裴”；裴茂的七世孙裴邕渡江移居襄阳，其另一支八世孙寿孙移居寿春，他们的后人在荆皖吴郡一带繁衍，号为“南来吴裴”。以上几支，《世谱》中合称“三眷五房”。事实上，裴氏后人在全国的分布比《世谱》所载还要广泛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后裔不少已流寓到台湾、南洋。但世远族分，总出三眷之后。俗语云“宗人遍天下”、“天下无二裴”，信不妄矣。据裴柏村老者回忆，直至解放前夕，每年春节、清明，时有裴氏后人，不远千万里，前来祭祖上坟的。这种寻根认祖活动，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甚至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从未中止过，只不过有时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方式而已。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华夏族不可移易的民族向心力和华夏古老文明的巨大凝聚力，其中蕴藏着一种历久不衰的民族精神力量。

诸裴在哲学、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天文历法、史学、文

学、语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诸裴为推动社会发展奉献了才力，历史也给了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裴氏一族历代被封为公的有八十九人、侯三十三人、伯十一人、子十八人、男十三人，高中进士的六十八人，其中六人高中状元，选为贤良的七人，辟举六十五人，举贤三十人，荫袭官爵的四十六人，由朝廷赐谥号的五十九人，子弟配得皇家公主的二十人。裴氏在二十五部正史中立传与标名者多达一千二百二十余人，有数十人立有功德碑，被百姓立祀纪念，真可谓业绩斐然，令汗青生辉。我们且看诸裴在许多领域的建树吧。

在裴氏多达三千的各类官员中，有众多卓有作为的政治家。首先，诸裴不少人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转折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后来做了晋司空的裴秀力劝司马昭立司马炎为嗣、受禅，终于开启西晋一统江山；前燕时乐浪太守裴嶷多谋善断，当慕容氏草创之始，大局难定，众人多存去留之志，而嶷能审时度势，首定名分，使众人同心辅佐慕容廆、皝父子建立前燕；北齐时的裴谒之，为了挽救国家危亡，白刃临颈，毫无惧色，而力谏文宣帝高洋不可再骄奢淫逸，贻误国事。隋文帝时朔州总管长史裴肃，为阻止杨广当太子，上书请求复立被废太子杨勇，遂被杨广登基后贬谪为永平县丞；隋末通议大夫裴虔通与司马德戡密谋在西阁捉住隋炀帝，配合宇文化及反隋；隋重臣光禄大夫裴仁基奉诏为河南讨捕大使，但他见腐隋大势已去，便率众参与了李密的反隋起义军，反戈一击，加速了隋的灭亡；隋末晋阳宫副监裴寂与李世民密谋反隋，并倾其所管资财，辅佐唐高祖灭隋，开创了大唐基业。天宝年间，在安史之乱中，御史中丞裴冕追随李亨至灵武，并与杜鸿渐极力劝进，助肃宗即位，终于平定了安史之乱。中唐重臣裴度在国家危难中迎立了唐文宗，遂稳定了国家局势。唐代调露年间曾任过中书令的裴炎，反对中宗岳父韦玄贞专权，因固执不从触怒中宗，就与则天皇太后经过谋划，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重新立豫王李旦为君。其后，等裴炎看穿武后篡唐的野心后，又极力反对，终于被武后以谋反罪杀

害。他的侄子裴伷先在裴炎被武后杀害后，秉承叔父裴炎遗志，反对诸武专权，力主“宜还太子东宫、罢诸武权”，而被杖责于朝堂，流放襄州。唐末平章事（宰相）裴枢原与朱全忠交好，当看出其篡逆之心后，坚决反对朱安插爪牙，以致被杀，尸体也被扔进了黄河。

诸裴中涌现的治世之能臣有：北齐时，裴让之以清正治清河，使“奸吏敛迹，盗贼清靖”。后魏时赵郡太守裴佗“为政有方，威惠甚著”。司空从事中郎裴叔义“为政清静，吏民安之”。裴芬之治东秦州亦有“清静”之称。河北太守裴夙“以忠恕接下，百姓怀之”。益州刺史裴宣治边有方，“甚得羌戎之心”。裴延俦政绩卓然，有“考绩为天下最”之称。南齐时裴昶不愿以外戚身份专权，拒向皇世子裴妃交出《裴氏家谱》，便分籍远避。五代吴越时中书令、丞相裴坚被史家赞为“多善政”。唐永淳、天授年间任太常博士、司府丞、成州刺史的裴守真“政不务威，吏民怀之”，“时谓才称其官”。裴垍为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但对政治得失能广开言路，奖励使言。裴潾力谏迷信方士仙丹，为大修道观而劳民伤财的宪宗。裴潍阻止睿宗在大旱之年修金仙、玉贞二观，且能为朝廷甄拔贤士。唐代的裴应“有吏干，慷慨敢言，好为规划”，太宗奖其忠谠，对其言多听取接纳。明代的裴承祖“治狱平允”。裴泰“行政一本慈恕”，“置旌善记恶簿，严缉盗贼”，使所治清平。唐代名相裴光庭勤于政务，功勋盖世。唐玄宗在其死后亲自为他书写碑志，以示褒奖。

裴氏中为政清廉名臣的事例如：裴坦之子娶杨收的女儿，妆奁多犀玉，坦愤怒地砸碎珍宝后说：“殃吾家矣。”时人称之为“太平宰相”。后来杨收终因贿赂而败。裴度临死，担心家人恃物骄纵，坚决将御赐的玉带交还朝廷。魏征的妻子裴氏也能节俭办丧事，她坚决辞去御赐羽仪，用布车载魏征灵柩而归。后梁有号称“廉约”的裴子野；北魏有“清白任真，不事家产”的裴佗（他）。北周有为政“廉约”的裴文举。唐代有反对“以国财求宠”的裴耀卿。特

别是北周时的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最”。周文曾在朝堂上让诸牧守中像裴侠一样的人出来，可以和裴侠站在一起。众人默默无语，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过去，时人称之为“独立使君”。有一首诗唱道“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尤其是唐代名臣裴度历仕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与文宗（李昂）六朝，史称“用之则治，舍之则乱”。他“神观迈爽”，四度入相，三遭罢黜，屡仆屡起，仍“正色立朝”，“操守坚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名震四海”。裴度除迎立唐文宗的盖世奇功外，还奉宪宗之命宣示昭书，收伏魏博六州，使魏人悦服。宪宗年间，吴元济盘踞淮蔡，为乱四方，朝廷多次征剿，均遭失利。朝臣多请罢兵，而裴度力请亲自讨贼，以身犯难，督师讨敌，终于在大雪之夜以奇兵擒住贼首吴元济，平定了多年的淮蔡之乱，削平藩镇，使唐朝重新归于统一，并给“元和中兴”做了准备，为李唐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为裴度纪功的“三绝碑”还屹立在裴氏宗祠内。

裴度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裴氏除裴度外的军事家和名将还有许多。汉代裴岑因北匈奴南侵，带部卒三千人，“克敌全师，诛杀呼衍王”，立功西陲，“勒碑西域”。晋代裴氏因军功被封大将军的就有裴武（元帝时）、裴开（成帝时）、裴冲（安帝时）与裴道子等。后汉时裴遵任敦煌太守时，从光武帝平陇蜀立了大功。建安年间的裴茂“奉使率导关中诸将讨李傕有功，封列侯”。前燕时裴嶷被慕容皝“委以军国谋”，用其计击破寇逼城下的悉独官，于是“威德甚振”。其子裴开“才略深远，屡进奇策，以定军国大事，被任为车骑司马、军咨祭酒”。北周的裴果“慷慨有志略”，征讨“每先登陷阵”，“从周文战河桥及芒山，勇冠当时”，“屡著战功”。裴宽在动乱中不失志节，被周文称为“疾风劲草”。裴侠从孝武“战沙苑，先锋陷阵，以功封侯爵”。后魏正光末年，汾州吐京胡作乱，裴庆孙招募乡勇讨之，“每摧其锋”，在世隆北渡后被诏拜为大都督。南朝陈时的裴子烈“以骁勇闻”名，“频

从吴明彻征讨，官至北谯太守”。裴忌当“侯景之乱，随武帝征讨，及帝诛王僧辩，僧辩弟僧智举兵据吴郡。忌勒下精兵直趋吴郡，鼓噪而入。武帝嘉之”。他在“宣帝时，历仕都官尚书，监吴明彻军北伐。善于抚绥，甚得人心”。梁时，裴邃“征邵阳洲，以功封为夷陵县子”。普通年间又以宣毅大将军督众北伐，捐躯军中。裴之横曾随王僧辩破侯景与武陵王。隋代的裴仁基“骁勇便弓马。平陈之役，以亲卫从征，先登陷阵，拜仪同”。其子裴行俨因“骁勇善战”，号“万人敌”。隋代的裴矩曾与文帝定征辽之策，并从行破辽，使隋北部边陲持续太平了几十年。唐代裴行立经略安南，平定环王国之叛人，使“蛮人悦服”。裴行俭通兵法，善知人，曾讨平吐蕃、突厥之叛，安定了唐王朝西北与边陲。裴度之子裴识在“宣宗时为泾源节度使，治保障，整戎器，开屯田，立限戍边。将士岁限满者”由别人替代，“亲七十就近戍。由是人人感悦”。唐代任将相十余年的裴均曾平定刘阙之叛。裴怀古平“定南方，蛮人立石著功”。裴向任同州刺使李纾判官时，李怀光叛乱。李纾逃往奉天，而裴向挺身而出，独自主持州务，与叛兵相持，攻开壁垒，招降了李怀光。同州没有失陷，完全是裴向之功啊！北宋时的裴济坐“镇太原、镇定二州，威绩甚著”，并在抗击西夏之战中为国捐躯。明代的裴斐曾“出按辽阳”，使“将领振肃，士卒悦服”。裴琏也“以平冠功，升河南副使”。裴应章在郧阳兵变时，“以右副都御史往抚，戮其渠魁，宥协从，乱遂定”。洪武初，裴伯耆曾在东海敌御倭寇，捍卫了东南海防。他还曾参与了平定安南、交趾之役。古语云：“乱出将，安出相。”裴氏诸功臣将相是时势所造就，诸裴也以他们的作为影响了时势的发展演变。诸裴在杀敌报国的战场上功勋赫赫，在军事科学的研究上著述也颇为丰富。至今尚能查到的军事著作就有裴行俭的《安置军营行阵等四十六诀》、裴绪的《裴子新令》（二卷）、裴守一的《军诫》（三卷）、《兵家正史》（九卷）和《行军周易占》等。

在法制方面，诸裴的贡献也令人叹为观止。隋代的重臣裴政在

仕周时曾参定《周律》，入隋后又奉命制定了《开皇律》（十二卷）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开皇律》废除了不少不合理的酷刑峻法，如非谋反不得诛灭九族等，还将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等，每种又分二至五等，这对恰当量刑与限制罚不当罪的政治迫害发挥了重大作用。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裴政在断狱量刑上，用法宽平，“有神明称”。唐代的裴子云判案公正神明。裴休制定完善了漕法、茶税法，使民有法可依，为时人称颂。裴琰之被时人称为“霹雳手”，前任“积案数百”，他“省决一日毕，名动一州”。裴潍任监察御史时，断案依法秉公，不阿权要，为“天下称之”。裴谞憎恶法吏舞文陷人，就作了一篇《狱官箴》以讽诫。有一次，正当国丧期间，禁止宰杀，功臣郭子仪家奴违禁。裴依然奏明朝廷。众人质问他为何不庇护重臣，他说：“今发其细过，以明不恃权安大臣耳。”众皆以为然。裴氏历代担任过监察御史、刑部尚书及侍郎者有百十人，所著关于刑律的著作如《贞观律》（裴宏猷）、《隋律令承圣降录》（裴政）、《删定开元后格令式》（裴潍）等就多达十五种之多，为立法、执法，以至法学建设，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诸裴在经济方面也有卓著贡献。后梁时的裴迪“为人明敏，善治财赋，精于簿书”。“太祖用兵四方，留迪以调兵赋。”唐代宰相裴休为了整顿漕运，著新法十条，恢复了太和以来久已废弛的漕运。他还“立税茶十二法，人以为便”。裴倩任“信州刺史，劝民耕田二万亩，以治行赐金紫服”。裴耀卿为发展经济，上书请求广开漕运，建议“置仓纳租，水陆分道”运输，“以实关辅”，唐玄宗极为赞赏并采纳。不满三年就积蓄粟米“七百万石，省运赀三十万缗”。有人劝他将这些纳于皇上，他不屑一顾地说：“以国财求宠可乎?”裴行俭在检校幽州都督时，曾引泸沟水，开稻田千顷，民赖为利。清代的裴谘度历仕郎中、知府、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侍郎、左都御史等。他在浙江海宁曾主持筑塘工程，在江西时奏请皇帝将税关由湖口移九江，改善了航运，大大方便了商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乾隆年间的裴宗锡则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蚕桑专家。

诸裴在外交方面的贡献也令人瞩目。隋代重臣裴矩奉诏至甘肃张掖，视察唐与西域通商情况，顺便察访西域四十四国民俗特点与山川地形，撰成《西域图记》三篇上奏朝廷。这对促进中原与西域的交往通商有极大价值。后来隋文帝以裴矩为经略使，“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裴世清访问日本。据《北史·隋书》载：隋炀帝大业四年（608），世清奉诏带领一行十三人，随日本使臣小野妹子回访日本，在日本受到日本人热烈欢迎。他晋见倭王，递交了国书及方物，展示了华夏伟仪，使倭王仰慕“海西”“礼仪之国”，并愿闻“大国维新之化”。世清回国时，倭王又遣小野妹子为使，带着留学生、学问僧前来中华取经。此事被传为中日邦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晋代裴秀则是中国地图学的奠基人。他针对当时地图绘制上没有规范，各自为法的状况，就与其副手潘璠经过研究制成《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此书成为我国地图史上用科学方法绘制的最早的地图集。在该书序文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图六体”，奠定了我国地图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基础。这“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斜和迂直。分率即比例尺，准望即方位，道里即距离，高下即高度，方斜与迂直即山丘、平原、盆地或国土郡县的平面图形以及道路、河流等的曲直形状。“六体”的提出为地图绘制制定了原则，规定了方法，在科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与西方地图学家托勒密的理论体系遥相辉映，堪称双璧。因而，裴秀也被尊为“中国地图学之父”。

裴秀之子晋代的裴頠则是一位哲学家。他从小就“弘雅有远识”，饱学精研，晋惠帝时做了国子祭酒，“奏修国学，刻石写经”。他对“时俗浮虚”的世风深怀隐忧，便作了一篇《崇有论》，其中认为万物的本质是“有”，即万物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与唯物主义的“物质是第一性”的观点近似。他以这种正视现实、重视人生的思想，来抨击那种虚无的人生哲学，从深层次上引导人们珍惜人

生，务实重业。

南朝刘宋时代的裴松之与其子裴骃、其曾孙裴子野并称“史学三裴”。裴松之“立身简素，博览坟籍”。宋文帝刘义隆使之注陈寿《三国志》，他“鸠集传记，广增异闻”。书成献上，文帝阅后赞叹道，“裴世期为不朽矣”。其子裴骃子承父业，采取九经、汉书与诸史各家之说，著成《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开创了“集解”这一注史新体例。裴子野秉承先祖遗志，撰成《宋略》二十卷，萧琛称其“评论可与过秦、王命分路扬镳”。

在文学方面，裴氏也是人才济济。晋代裴启著的《语林》，开创了语林小说新体裁。作为一本小说集，《语林》不仅要比《世说新语》还早一百七十年，并且在选材与写法上为后世笔记小说的创作开了先河。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就对《语林》作了高度评价。后魏时裴伯茂“博涉群书，文藻富赡”。裴延儁“颇有才笔”。裴修善于写赋，以《怀田赋》闻名。裴敬宪“学博才清”、“五言之作，独擅于时”。裴庄伯“器度闲雅，文笔与敬宪相亚”。南朝梁裴子野著有《文论》，在文体研究领域有一定影响。他为梁武帝起草《移魏文》，受诏立成，梁武帝目之曰：“其形甚弱，其文甚壮。”自是“诸符檄皆令具草”。北齐时的裴让之“清明俊辩，早得声誉”，尤善诗词，时称“能赋诗，裴让之”。唐代的裴敬彝“七岁能文章，宗族重之，号‘甘露顶’”。裴庭裕起草文书，才思敏捷，下笔即就，号称“下水船”。明代裴纶因文名闻达于帝，入于翰林，时逢权贵王振欲挟嫌加害，因明英宗于朝堂问：“翰林白面裴纶何在?”而免于受害。唐代裴紫芝著成了《续卓异记》，裴约著有《言灵异志》，裴铏著有小说集《传奇》一书。其中著名的传世之作有《昆仑奴》、《聂隐娘》等。其余篇什虽多已散佚，但由他提出的“传奇”一词却成为唐代小说的专名，为后人所沿用。元代裴居敬“积学励行，家蓄书至两万余卷”，成为当时有名的藏书家。清代裴希度家中专门修了一座“息斋”来藏书。今天可以查到的裴氏诸才子个人诗文集尚有三十余部，连裴衍敬的妻子

潘梦鸾也出过一个诗集《兰雪诗草》。尤其是唐代的裴矩与欧阳询等合编成的《艺文类聚》，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类书，全书百卷，征引唐代以前失传古书1431种，保存了大量文史资料，故至今还被世人广为使用。

裴氏在科学研究上卓有贡献的也不乏其人。裴秀、裴子道、裴士淹等都著有关于《周易》的研究专著。在医学方面唐代裴王庭著有《五色旁通五脏图》（一卷）；宋代裴宗元等著有《药诠总辨》（三卷）；清代裴宗中则著有《言医》。在天文历法方面，宋代的裴伯寿则有《纪天历纪》（六卷）、《统元历五星立成》（二卷）、《统元历义》（二卷）和《统元历考古日食》（一卷）等八种著作。

在文化学的研究方面，诸裴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在语言文字研究上，有东汉裴瑜的《尔雅注》（五卷）。这部著作为同乡后人郭璞注《尔雅》作了体例和资料方面的准备。郭璞的《尔雅注》遂成为最通行的注本。唐代裴务齐有音韵著作《切韵》，这种注音方法一直沿用到本世纪初发明了汉语拼音，被沿用了一千年才基本停用。勿庸置疑，这种方法在帮助人们认字正音方面发挥过极大的作用。诸裴在史学记述研究方面有正史，别史达三十余种；在礼俗方面，裴頠的《冠仪》、裴松之的《丧服经传集注》，都是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著作；在民俗学方面有裴子野的《方国使图》与裴矩的《高丽风俗》；在官制礼仪制度方面有裴宪的《朝仪》、裴子野的《附益谥法》与《百官九品制》、裴行俭的《唐循资格》；如此种种，真是包罗万象，不一而足。

在艺术方面诸裴同样也是代有奇才，硕果累累。后魏时的裴询，多具艺能，精通音律与博弈。裴敬宪工于草书、隶书，并精通音律。又因为他家世世有恩德于乡里，以至使贼人过其宅，而相约不予犯扰。唐代裴休的楷书“遒媚有法”；唐代大书法家裴漼手书的《嵩山少林寺碑记》被誉为“少林第一名碑”，该碑至今尚存，仍在向人们宣示着裴漼翰墨的风采与神韵。裴行俭“兼工草、隶”，并撰有《选谱》和《草字杂体》达数万言；裴谞“画山水极有思

致”；裴孝源精通绘画，尤其善于画水牛，并著有《画品录》、《贞观公私画史》各一卷，后者考评贞观以前的古名画录，被誉为中国鉴赏家之祖；裴修然“好诗酒”，善于“丹青丝竹”；裴潾“笃学善隶书”；裴辽则“工画山水，兼善鹭牛”。宋代的裴文睨工于画水牛，与同时的戴嵩、厉归真二人齐名；裴叔永“善写兰竹及枯木怪石”。明代的裴日英“工画花鸟。尤善墨竹坡石”。清代的裴徕度还是一位大书法家，康熙帝曾“亲试其书法，列为当时第四家”。裴秀还有著名的《乐论》。

诚然裴氏也出了些谄佞如裴玄龄、反复如裴仁基、淫奢如裴均的复杂人物，但瑕不掩瑜，仍无损于整个裴氏人才团的灿烂辉煌。

裴氏两千六百年来冠裳不绝，德业盖世。这一令人目眩的历史现象自有其深广、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我们不能仅满足于瞻仰这光彩夺目的历史画卷，还应当用现代意识，历史科学，从社会学和人才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综合考察，深入研究，以求深刻地昭示产生这一奇异现象的复杂原因与规律，为透视漫长的封建社会，研究传统文明，弘扬民族文化，探讨当代人才产生、培养、成长和利用提供一点历史与科学的思索。

这套《河东裴氏研究丛书》共有四部：《裴氏人物志传》（之一）、《河东裴氏历史现象简论》（之二）、《裴氏著述大观》（之三）、《裴氏春秋》（之四）等，四部书相对独立，又密切相关，从不同侧面，采用多种方式，真实、全面、深入地反映奇特的裴氏历史人文现象，以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研究体系。

本书——《裴氏人物志传》为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全书采用群传、独传、合传、附传、寄传、代传等形式撰写。共收集、采摘了三百多篇裴氏人物散见于正史、方志与其他专著、工具书中的传记；无传的重要人物则由作者根据多种资料自行编写，以填补空白；凡能查到的有关传主墓碑、墓志铭、功德碑以及朝廷颁发的诏、制、敕、命均附列于后，传内未予反映的传主事迹也附于传后；每篇传记还列出了相关的裴氏人物姓名。凡有条件者，均标明

了世系、籍里、朝代与生卒年。每篇还做了详细注释。本《志传》涉及到裴氏人物达一千余人，在篇目人数上都远远超过了正史的著录。笔者在写作中，力求囊括无余，持之有据，考订详明，忝为裴氏研究的深入开展，进而为弘扬民族文化，服务于时代，以尽绵薄。

笔者从事本课题的研究，虽说已历十度寒暑，但只能说是初涉海边。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深觉力不从心，只能以勤补拙，迎难而上。在拙著即将问世之时，欣慰中又充满了惶恐。至于书中舛误衍讹，不敢言无。加之，碑文历年既久，磨蚀不清，多有难以辨识者，臆测武断，难能无误。如此之类，笔者诚望宇内方家、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谨向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社科联、闻喜裴氏研究会，北京、上海、山西各图书馆，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各博物馆、文物馆以及关心、支持本书编撰工作的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 西江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

编撰体例

一、作为《裴氏人物志传》，本书只收录裴姓产生以来至民国初年见于二十五史、方志（州、府、县志）、谱牒、碑志等等中有传的人物，余者不录。至于裴姓产生早期的历代先祖，仅在《发祥初祖之源流》一篇中述及。

二、本书按国史、方志、谱牒、石刻之序取材；传主传记，如果于以上多处屡见者，选前不选后；对于传记同载几部史书者，选详不选略；所记同一史事，内容互有参差者，或后者较详，将未选之书所记内容融入注释之中，以为备异或补充。所选传主传记未录，而见于其他传文的史事，以补记形式抄录于同一传主传记正文之后，其前标加“补记”，其后注明出处；对于无传而事迹散见者，由作者辑录作传，为了连缀成篇，其文字或有不影响其内容的些许改动。为了保障内容的真实性、科学性，本书对有关传主资料的世系、生卒、事迹以及相关文字进行了考订、校雠、更正。

三、传记与补记之后附与传主相关的墓志（铭）、墓碑、功德碑、诏命、制敕等文献资料。缺字以□或（缺）标出。这一部分，除重要内容稍作注释外，凡有可能一般均对原文进行标点、校勘，并加简短按语，略作考证，并注明出处。以上内容按〔附〕或附〔1〕、附〔2〕列后。

四、诸史无传者，则以墓碑、墓志铭、谱中“行述”等作为“代传”。“代传”在传主名后标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